

和谐背后的对立与冲突

——美国社会史论集

王心扬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和谈后的对立与冲突

——政治小丑的末路

文 / 钱海

图 / 王伟

设计 / 刘洋

编辑 / 陈雷

校对 / 陈雷

排版 / 陈雷

责任编辑 / 陈雷

封面设计 / 陈雷

封面制作 / 陈雷

封面设计 / 陈雷

封面制作 / 陈雷

封面设计 / 陈雷

封面制作 / 陈雷

和谐背后的对立与冲突

——美国社会史论集

王心扬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谐背后的对立与冲突：美国社会史论集 / 王心扬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1

ISBN 978-7-5203-1475-6

I. ①和… II. ①王… III. ①社会史-美国-文集 IV. ①K71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015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51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收入这部文集的 14 篇论文和读书札记，是我 20 多年来在中外学刊上发表过的一部分文字。虽非一时所书，但都是围绕着美国社会史上几个主要问题所做的讨论，特别是阶级冲突和种族矛盾，也有少量篇幅是讨论性别问题的。大家都知道，美国社会史的主要关怀是“种族”、“性别” 和“阶级”，其中最突出的是种族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研究合众国历史的难处所在，因为尖锐的种族对立使得美国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都变得十分复杂，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的历史上相对比较少见。^① 例如，E.P. 汤普森（E.P.Thompson）里程碑式的专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主要是探讨英格兰的阶级问题。然而，要讨论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美国工人分为白种、黑种、黄种和拉美裔，而每个种族内部又常常分为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的族群。种族之间和族群之间的矛盾使得美国工人在很长时间里未能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撰写一部《美国工人阶级的

^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种族矛盾。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以及欧洲历史上的排犹运动（pogrom）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然而，加、澳等国的种族矛盾和欧洲排犹运动对人类历史的影响都不如美国奴隶制、美国内战和民权运动那样深远。同时，美国关于种族问题的理论以及美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都对其他国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形成》的任务不知令多少优秀学者望而却步。以笔者有限的学识，研究美国社会史是比较勉强的，这 14 篇文字只是一种初步的探索。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在这些论文写作过程中试图理解的几个问题。

多年来的学习和研究使我认识到，在美国历史上，“种族矛盾”、“阶级冲突”与“性别隔阂”并非互不相关的社会现象，它们之间往往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例如，在 19 世纪，特别是在美国南部和西部，种族主义十分猖獗，欧裔工人歧视有色人种的现象异常严重。这意味着他们对种族偏见的执着超越了对阶级团结的追求。然而，在东北部，由于一部分白种工人具有阶级觉悟，不同程度地克服了种族主义，因此，他们能够积极吸收黑人和华工加入工会。这又说明“阶级”是可以超越“种族”的。另外，中产阶级妇女是 19 世纪戒酒运动中的一支主力军。由于这场运动主要是针对男性蓝领工人，所以，中产妇女主张戒酒既表现出阶级对立，也包含着性别矛盾；同时，由于酗酒的受害者主要是蓝领工人的妻子，所以中产妇女对工人阶级妇女的同情又说明性别因素超越了阶级因素。弄清楚种族隔阂为什么常常重于阶级对立，“阶级”在哪些情况下能够超越“种族”，以及“性别”在哪些情况下能够超越“阶级”，这些都是美国社会史面临的艰巨任务。虽然这部文集里没有专门论述“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关系的论文，但是在讨论移民史、亚裔美国史和戒酒运动的文章里，我对各种社会矛盾之间的互动还是尽可能地给以关注。

我所做的另一项努力，是批判亚裔美国史中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一元论历史观。持一元论历史观的学者认为，影响亚洲移民经历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是来自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其他因素，即使存在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由于他们看上去是在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鸣不平，因此，这种似是而非的历史观多年来竟然大行其道，误导了不少读者。我一向旗帜鲜明地谴责种族歧视，而且承认种族歧视是影响移民史、少数族裔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认为，种族歧视不是影响美国少数民族历史的唯一因素。要比较全面地和令人信服地诠释移民

史、少数民族史，除了种族歧视，每个族裔面临的经济机会、他们的文化传统，以及白种工人的阶级觉悟等因素都必须考虑进去。读者从这部文集里也可以看到我用多元论的方法诠释美国少数民族史的努力。

在这部文集付梓之前，我针对一部分文字做了少量的修改和润色，但文中的主要观点一律没有改动，它们所反映的仍然是我当年写作时的认识水平。^① 例如，第一篇论文《美国新社会史的兴起及其走向》是1993年开始准备的。当时我指出，新社会史今后仍会继续影响美国史坛。现在，随着新社会史的许多方面逐渐为新文化史所取代，这个学术领域的全盛时期显然已经过去了，我当年的预言似乎过于乐观。不过，我当时多少还是意识到新社会史的某些薄弱环节，特别是忽视政治。我在文中指出，“只有研究政治和普通人文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才能真正理解美国人是如何行使和如何传送权利的，才能进一步了解美国历史的本质。”在随后的研究中，我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我在《19世纪美国政府对待社会暴力的双重标准》这篇论文里，探讨了美国政府政策与社会暴力之间的互动，并得出结论说，“至少就对待社会骚乱的态度这一点来说，19世纪的美国各级政府或多或少是代表剥削者和种族主义者的利益的。这种对待暴力的双重标准或许还说明，19世纪白人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攻击之所以此起彼伏，同政府的姑息容忍有很大关系”。

不过，我所做的这些努力终归只是一种努力，由于学识不足，恐怕远没有达到新社会史“观微而知著”的宏伟目标。但是我真诚地希望这些不成熟的见解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期待着不久能够读到真正深入讨论美国社会矛盾的佳作。

^① 这部文集中有两篇读书札记最初是作为书评发表的。由于美国的刊物对书评字数有严格限制，我一般是先把自己读后的想法全部写下来，暂时不理会字数的限制，在交稿前再压缩到杂志要求的字数。现在书评变为读书札记，不过是回复到压缩之前的篇幅。

此外，还应该交代一下，本书有三篇论文是比较意大利移民和中国移民经历的，包括阶级意识的成长、小团体忠诚的兴衰，以及宗教传统对他们在美利坚适应过程的影响。这三个议题都涉及两组移民的农村背景、涉及他们在美国的经济机会，也涉及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因为它们最初是三篇独立的文章，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因此，每篇论文都不得不提到上述几种情况，无法像撰写专著那样，前面提到的事情后面可以省略。希望读者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重复”。

最后，我还想指出，这部文集取名为“和谐背后的对立与冲突”，是因为其中的论文主要是讨论美国历史上各种社会矛盾。不过，虽然对立与冲突是美国社会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但合众国的历史上并非完全没有和谐，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美国人在“二战”期间以及在“9·11”后反恐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团结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和谐史学”的缺点是将美国的过去完全归结为和谐。但如果我们将美国历史完全归结为对立与冲突，那我们就会犯同“和谐史学”一样的错误。

目 录

美国新社会史的兴起及其走向	(1)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自由与桎梏	
——读戴维·蒙哥马利教授《作为公民的工人：19世纪美国 工人与民主及自由市场交往的经历》一书札记	(26)
经济机会、工匠领导与移民工人的斗争性	
——1890—1970年纽约意大利裔和华裔移民工人的比较 研究	(34)
工作场所孕育的小团体忠诚	
——纽约市意大利移民与中国移民小团体忠诚的兴衰 (1890—1970)	(57)
《妇女与工会：建立伙伴关系》一书读后	(82)
圣母敬奉与祖先崇拜	
——宗教传统在纽约意大利裔与华裔移民适应过程中的 作用(1890—1970)	(93)
论罗得岛多尔起义的性质	
——兼议美国早期工匠的政治性格	(115)
亚裔美国史可以成为美国移民史的一部分吗	(136)

2 和谐背后的对立与冲突

约瑟芬·法勒《日本和中国移民积极分子：美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组织活动，1919—1933》一书读后	(145)
亚裔美国史学五十年：反思与展望	(153)
20世纪初美国劳工外交理念的一次重大转变	(183)
19世纪美国政府对待社会暴力的双重标准	(205)
美国劳动骑士团种族政策的再探讨	(230)
19世纪美国戒酒运动中的社会矛盾	(253)
后记	(277)

美国新社会史的兴起及其走向^①

新社会史是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史学派别。^② 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历史，因而不但揭示了许多过去未曾讨论过的问题，并且对相当一部分已成定论的问题也提出了质疑。就给史学界带来的冲击之大而言，以往的任何学派似乎都不能与新社会史相提并论。有学者甚至将这种冲击比做是一场地震。这场地震由于积聚了几十年的能量，一旦爆发出来，便冲垮了所有旧史学所构筑起来的堤坝。^③ 就其

① 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曾参阅了很多学术著作，包括 David Montgomery, “To Study the People”, *Labor History*, Fall, 1980, Vol. 21, Issue 4; David Brody, “The New Labor History”, in Eileen Boris and Nelson Lichtenstein eds., *Major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Workers*; Lexington and Toronto: D. C. Heath, 1991, Alice Kessler-Harris, “Social History”, in Eric Foner ed., *The New American Hi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63–184; Linda Gordon, “U. S. Women’s History”, in Foner ed., *The New American History*, pp. 185–210; Thomas C. Holt, “African-American History”, in Foner ed., *The New American History*, pp. 211–231; Leon Fink, “American Labor History”, in Foner ed., *The New American History*, pp. 233–250。以下除个别论述以外，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② 应该指出的是，新社会史并非只兴起于美国。事实上，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甚至比美国稍早，英、德等一些西欧国家的史学家们也已经在开创各自国家的新社会史了。但本文所关注的是美国的新社会史。

③ John Higham, “Introduction”, in John Higham and Paul K. Conkin eds.,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xiii.

影响力之久而言，新社会史从它的兴起至今历 30 年而不衰，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还会继续影响美国史坛。鉴于新社会史的巨大影响，有必要以中国人治学的眼光，对这个学派的功过是非做一个全面的检讨。然而，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把这个学派的兴起及其走向勾画出一个轮廓来，许多优秀社会史著作都因而不能给予足够的注意，甚至一些最有影响的著作，也不得不一带而过。挂一漏万，几乎是肯定的。

一 总览

我们都知道，政治史和思想史在美国史坛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史一词虽然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私生活。由于它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上层人物的活动上，所以，这种社会史和政治史、思想史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新社会史则一反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治学常规，将研究的重点完全转移到社会上最普通的人物——工人、移民、妇女、黑人、亚裔，等等——和他们的活动上去了。认同新社会史的学者，不论他们之间有哪些歧见，都一致认为，美国社会是由不同阶级、不同种族和不同性别的人所构成，因而美国文化也是一个多元和具有冲突的文化。只着眼于上层人物的经历，不研究普通人的活动，便不可能全面了解美国历史的本质。由于新社会史学家是从普通人入手去研究历史，他们将自己的治学方法称作是“自下往上观察历史”（viewing history from bottom up）。

从思想层面上看，新社会史的兴起是对所谓“和谐史学”（consensus school）的一种挑战。“和谐史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到 60 年代初在美国史坛上独领风骚近 20 年。这个学派的一个主要关怀是探讨所谓的美国思想、美国传统和美国性格（American character）。一批有影响的史学著作，如亨利·康麦格（Henry S. Commager）的《美国思想：对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思想和美国

性格的诠释》^①和理查德·霍夫斯坦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政治传统和那些塑造这个传统的人》^②，就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在研究其他课题的史学著作里也同样弥漫着一种“和谐”的气氛。比如，移民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移民从欧洲到达美国以后，很快就丢掉了他们固有的文化传统而同化于美国社会。在和谐史学家看来，美国社会的本质，倘若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和谐而无冲突。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正是美苏之间的冷战不断加剧的时期。面对苏俄这个劲敌，美国需要自信，也迫切需要自身的团结。在这种形势下，强调美国社会的和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到了60年代，新社会史转而强调多元和冲突，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以大动荡而著称。首先是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美国的少数族裔，包括黑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亚裔，经过50年代和种族主义的几次较量^③，这时已普遍开始觉醒，再加上有不少白人出来支持他们，于是便大张旗鼓地抗议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一些黑人甚至表示不惜使用暴力和种族主义者决

^① Henry S. Commager, *The American Mind: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Thought and Character Since the 18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②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8.

^③ 研究民权运动的学者一般都认为，20世纪50年代所发生的两个事件，即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布朗控告堪萨斯教育局”一案（Brown vs. The Board of Education）所做的判决和1955年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抵制公共汽车的示威活动（Montgomery Bus Boycott），严格说来，就是民权运动的开始。1954年，一个名叫奥利佛·布朗（Oliver Brown）的黑人送他的女儿到堪萨斯的一家公立学校去读书，但是遭到拒绝。教育局要他把孩子送到黑人学校去。布朗不服，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在判决书中指出，在学校实施种族隔离是违反美国宪法的。1955年，一名叫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的黑人妇女在蒙哥马利市搭乘公共汽车，她拒绝坐到为黑人保留的座位上，从而遭到逮捕。结果全市黑人举行游行，抗议种族隔离制度。联邦最高法院在1956年也做出判决，宣布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的种族隔离政策为违宪。

一胜负。与此同时，妇女运动也逐渐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女权主义者向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她们要求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和平等升迁的机会。到了 60 年代后期，越战的不断升级也引发了社会的普遍不满。很多大学校园里都爆发了激烈的反战运动。民权、妇女和反战运动又常常汇合到一起，演变为暴力和流血冲突。这些暴力事件使得一部分史学家开始对“和谐史学”的观点产生了怀疑。他们察觉到，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似乎并不和谐，而是充满了紧张和冲突。

这些史学家进而发现，现存的历史书籍大多为男性的白人作者所著，他们所反映的不过是男性、白人和中产阶级新教的文化，并不能代表全部美国文化。以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这个概念为例。共和主义始终被认为是全体美国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可是经过社会史学家对不同阶级和不同性别的美国人进行分析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原来，美国人对共和主义的理解一向因为他们阶级背景和性别的不同而见仁见智。对于 19 世纪初期的工匠来说，共和主义意味着自由劳工制度和升迁的机会，可是商人却把它解释成取消政府对贸易的限制。到了中产阶级妇女那里，共和主义和“受教育的公民”成了同义语，而劳动妇女则认为 republicanism 可以保证她们不沦落为奴隶。^① 这些学者还领悟到，即使是研究美国的政治史，如果只把精力集中在上层人物的活动上，其研究结果也会是片面的。因为在民主社会里，选民的情况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而选民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和投票方式往往因为阶级背景、种族和性别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纽约州的民主党长期控制在爱尔兰人手中，而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因为与爱尔兰人不睦，所以每逢选举便会去投共和党的票。这些新发现进一步促使学者们去探索美国文化多种族、多阶级和不同性别的本质。

^① 参见 Kessler-Harris, “Social History”, p. 170.

新社会史的兴起除了是受 60 年代社会动乱的激荡以外，来自欧洲和美国思想界的影响也值得重视。多年来，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一直主张研究事物的内在结构。他们认为，研究普通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有助于发现历史事件形成的构架。本来，这个学派对美国史学界的影响并不明显。可是到了 60 年代，新社会史要对不同团体和不同地区的历史做具体研究时，年鉴学派所提倡的观微知著的治学方法就忽然变得有吸引力了。此外，社会史学家还受到行为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开始追求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他们觉得人文学科的治学方法过于主观，只有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其研究结果才会比较客观和精确。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家泰尔克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治学方法。帕森斯认为研究事物的结构可以促进对社会制度的理解。在帕氏看来，国家和社会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因为新兴事物对现存结构的挑战而引起的。这种挑战的结果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平衡（social equilibrium）。^①

近年来在欧美学术界重新抬头的马克思主义也启发了相当一部分社会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制度和人的行为都有它们的物质根源，因而历史的发展从属于某些科学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对立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所谓社会平衡不过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机制（mechanism），这种机制是用来为经济上的不平等做辩护的。不论新社会史学家是否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标签，马克思主义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已经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② 其实，美国新社会史的几位开拓者如赫伯特·葛特曼（Herbert Gutman）和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无一不是师承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的。汤普森在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

^① 参见 Kessler-Harris, "Social History", p. 166。

^② Ibid., p. 167.

形成》中明确指出，“阶级的经验主要是受生产关系制衡的”^①。不过，在汤氏看来，阶级的形成不仅仅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是由于文化上的原因。事实上，人的阶级意识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如传统、价值系统、思想和制度等等。^②《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对工人阶级在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文化，特别是技术工人的传统和宗教，做了深入的检讨。我们知道，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者曾经预言，阶级意识和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将产生于工厂工人当中。可是汤氏却用大量的史实证明，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后，率先产生阶级意识的是工匠，而不是工厂工人。^③ 汤氏的研究不仅把工人的文化提上了社会史的议事日程，而且他的著作也树立了一个研究工人阶级地方史的典范。比《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稍晚些时候，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纪尔兹（Clifford Geertz）在他的名著《对文化的解释》中也郑重地提出，只有研究文化的特殊性才能发现人类文明的真正含义。^④ 纪尔兹的告诫进一步促使社会史学家深入探讨普通美国人的地方史。

前面已经说过，新社会史认为所谓“美国思想”和“美国性格”都是从上层人物留下的书面文字中得出来的结论。现在社会史学家既然是致力于研究工人、妇女、黑人和移民的文化，探讨这些最普通的美国人如何居住、如何迁徙，以及如何投票，而且对每一个城镇、每一个地区的历史逐一进行细致的研究，那么很明显，在史料的选择上也必须另辟蹊径了。新社会史并不忽视精英分子所留下来的文字，但他们更主要的是从工人的讲话、工会会议的记录和移民的书信、报纸

①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6, p. 9.

② Ibid., p. 10.

③ Ibid., pp. 240–241.

④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especially, pp. 3–54.

中去挖掘普通人的文化。可是大多数工人、移民和妇女所留下的文字毕竟不多，于是许多社会史学家又深入到工人、移民和黑人当中进行调查，把这些人的谈话记录下来，作为研究史料，开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之先河。^① 新社会史不但要探讨工人、妇女、移民和黑人的地方史，而且它的研究涉及制度、思想和习俗等重要课题，有关新社会史的著作之多，真可谓“入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不过，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只就劳工史、妇女史和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成果做一个评论。因为阶级、性别和种族一向被认为是造成美国多元文化和社会冲突的三大基本因素。

二 劳工史

劳工史最早出现于 19 世纪末，创始人是威斯康星学派的约翰·康门斯（John R. Commons）。康门斯是治经济学出身，但兴趣却在历史方面。他有关劳工问题的著作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挑战。大家都知道，古典经济学主张市场的绝对自由，这个学派既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反对工人组成工会同雇主进行集体交涉。康门斯和他的学生们却起而为工会进行辩护。他们认为工人有权组织工会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康门斯学派主要是研究市场对工人的技术、生活水准和组织能力的影响。不过，他们始终把精力放在工会的活动上，换言之，他们研究的是制度而不是工人的文化，所以被称为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 school）。^② 康门斯学派对劳工史的研究一向受到承认和尊重。不过，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即使在工会运动的鼎盛时期，也只有 1/4 的工

^① Kessler-Harris, “Social History”, p. 168.

^② David Brody, “The New Labor History”, in Eileen Boris and Nelson Lichtenstein eds. *Major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Workers*, Lexington and Toronto: D. C. Heath, 1991, pp. 2–4.